

「值得推薦的中國近現代史著作」座談會紀實*

陳中禹、莊建華記錄整理**

一、國史館致歡迎詞

今天很難得，近代史學界的長者們能一同來館，我當初的目的是想製造一個機會，讓館內同仁能跟前輩請益，於是勉強拼湊一個題目，即「值得推薦的中國近現代史著作」。這是我當年考哈佛大學時被問到的題目，現在拿這個題目向這些前輩請教。這三位教授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付出一輩子的心血，相信所推薦的著作必有其特殊意義。

二、張朋園教授談美國方面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

林館長的題目把我跟張玉法教授考倒了，三十年前是我考你，現在換你考起我來。在來館之前與張玉法教授討論要如何談這題目，我推測林館長的意思大概是要我們談目前比較值得推薦的教科書或近代史研究。我們決定談談目前中外方面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教科書。以教科書而言，張玉法教授可說是專家，他來談一定非常精彩，但我沒有寫過教科書，所以決定由他談臺灣方面的著作，張海鵬教授談大陸的教科書，我來談美國方面的著作。既然館長也允許談自己的著作，當然我也要談自己的書。

因為時間有限，我主要想談Peter Zarrow（沙培德）的著作*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895-1949*。

美國繼承歐洲的漢學研究，但是不似歐洲漢學家從古代史研究起，而是著重近代中國研究。所以美國的近代中國研究相當傑出，不比臺灣、大陸、日本的研究遜色。大約1950年代，美國即有中國現代史的教科書，但其實是東亞近代史，其中亦包含日本、韓國的部分，算是第一波。

後來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寫了好幾本中國近代史的教科書，其中有本代表作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書名看起來好像談中美的外交史，但其實是中國近代史。後來他又寫了很多有關中國歷史的教科書。Peter Zarrow的這本*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895-1949*，是2005年出版的，出版後頗獲好評，原因是他先寫了38篇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書評，可說充分瞭解美國對中國現代史研究後，才動手寫這本書。全書共分十八章，章節非常多，但內容非常精鍊，書名可中譯為《中國處於戰爭與革命之中1895-1949》。這本書從清末談到1949

* 「值得推薦的中國近現代史著作」座談會係於2009年10月22日下午2-5時假本館溥泉館一樓會議室召開，由林館長滿紅主持，三位與談人為張玉法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張朋園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及張海鵬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 陳中禹現任國史館修纂處助修，莊建華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座談會由林館長滿紅（右二）主持，三位與談人左起為張玉法院士、張海鵬教授、張朋園教授。

林正慧攝

年中國的變化，也就是我們瞭解的中國現代史的這個階段，他以「戰爭與革命」來形容這個時期的中國，實在非常恰當。

美國對中國的瞭解，過去一直籠罩在費正清的理解之下，一直在「西力衝擊」與中國的錯誤反應的模式下，討論一個悲慘近代史的大觀念，這種詮釋籠罩美國四、五十年之久。美國學界後來反省，應該從中國本身的思想和社會去看問題、去看中國本身的動力，Peter就是受到這個新觀念的影響，才寫了這本書，他挑了四位影響中國現代史的關鍵人物，即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重新檢視這個問題。

袁世凱在美國學界看法有三：傳統的袁世凱、現代化的袁世凱，傳統加上現代化的袁世凱，光袁世凱的評價在美國即有很複雜的見解。對孫中山的看法，依照Peter的解釋，孫中山晚年接受列寧影響，不走政黨政治，改走一黨一國的作法，以黨治國，國無二黨。Peter

主要談孫中山的改變，與其早年民主觀念有所不同。

Peter認為蔣介石的思想無甚突出之處，僅是追隨孫中山觀念，孫中山要他走一黨專政之路，他就走這條路；然對汪精衛政權則有較理性的評論，並譴責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大屠殺。對於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描寫則頗為生動，Peter描述毛澤東信仰馬克斯、長於組織、長於鬥爭，雖僅寫到1949，但對毛澤東亦有深入介紹。

他在書中還有個重要觀點，即中國近代的民主主義，我們知道這是中國近代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Peter認為知識分子對於民主主義的瞭解，是菁英分子的一種思考，並非很全面性的思考；一直到了毛澤東時，從喚醒無產階級，走向全民革命的方向，才普及基層。

我個人認為這本書寫得不錯，但若挑剔缺點，則是對國民政府的階段還不十分深入，對經濟方面著墨也少。原

因我認為是民國史的研究，尤其是經濟發展方面，目前研究仍不多，故他這方面也沒辦法深入。Peter的文字很簡單，極易閱讀，比一般美國的教科書，更為淺近，可以說有思想史、有斷代史，又重視中國動力變遷的問題，若能翻譯成中文，將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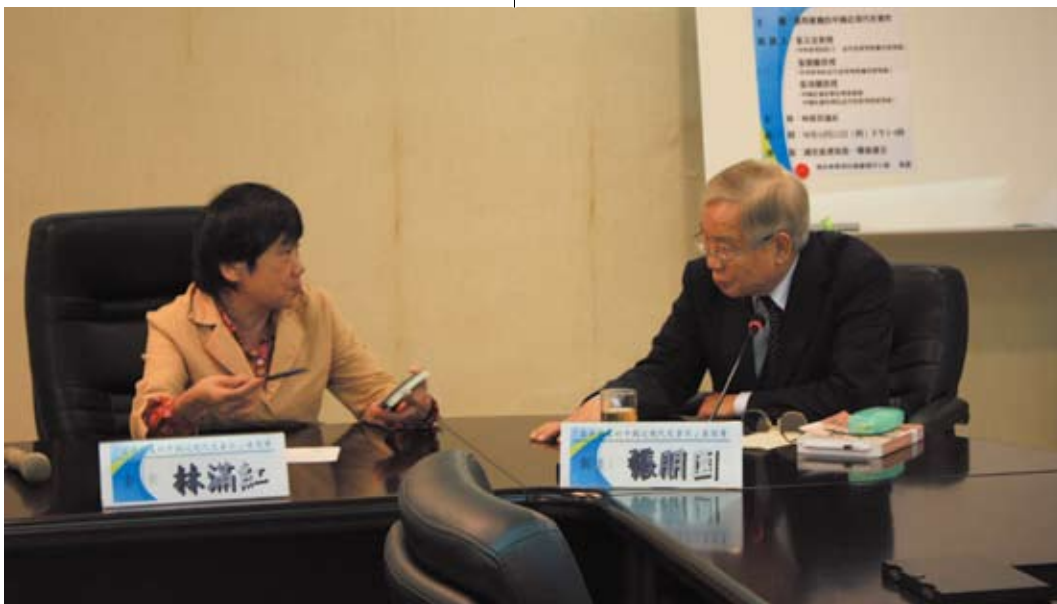
接著談我個人的著作，我最近出版《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來歷屆議會選舉述論》。我一生關注的問題，便是中國的民主政治有沒有希望？滿清末年諮議局成立，是走向君主立憲的措施，過去的諮議局、資政院，都是為了讓中國人練習如何運作民主政治。中國有民主政治可以從清末開始，但是過去能參與的人，都是具有功名之士，像是傳統儒家、知識分子，能參與政治的比例非常之低，若以當時中國五億人口來看，這些民主的參與者大約僅千分之四。

這與西方民主政治發展，其實也有相似之處。西方本來也是貴族，再有中產階級的加入，然後逐步走向全民參與，這是合理的現象。民國以來的選舉，除清末、1912、1918年的選舉外，1947-48年時，中國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都算是全民參與的機會；參與政治人口比例從千分之四增加到百分之十，

增加幅度可以說很快，雖然以今日觀點來看，參與的人還是很少。

我採政治學的一個觀念詮釋民主政治，就是每個國民都有選票，都能投票，便叫做民主政治。從這個觀念看中國，滿清末年是有選票，1912年增加到百分之十，也是有選票。但中國的民主政治實際運作起來，還是有很多毛病在其中，表現在1947-48年的選舉時，最為明顯。其中關鍵在於選票是有的，但卻受人為力量控制，即受官員、辦選舉、辦黨務的人控制。

第二、候選人的資格。國民黨統治時期雖然是百分之百的公民都有投票、選舉權，但是候選人並非可以自由去競選，候選人都要經過國民黨的決定。所以候選人百分之八十都是國民黨，有百分之二十，是國民黨應付黨外壓力，給青年、民主社會黨及另外一般民間有聲望、非國民黨之人，這也還在國民黨控制之下。整個看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屬國民黨所控制，候選人必須經過國民黨許可，才可以參加候選。由此觀之，國民黨作法與政黨政治的原理嚴重脫節。政黨政治應是公平競爭，以臺灣最近十年來的選舉，民進黨與國民黨的競爭，我們看民進黨能夠奪取政權，國民黨又能再次奪回政權，這就是政黨政治，看選票



林館長滿紅（左）與張朋園教授（右）

林正慧攝

多寡、人民的選擇，完全訴諸選票。但今天大陸仍舊未能做到，仍在控制選票、控制候選人，這是不上軌道的。很明顯的，民主政治在中國直到1949年，都沒有得到發展的機會，沒有自由運作的機會，最後是到臺灣才改變的，但我並沒有談到1949年以後的部分。

三、張玉法院士談臺灣方面的中國近現代史通論著作

我比較關心的是大部頭的中國近現代史通論著作。臺灣史學界六十年還不能寫出一部較有系統、學術性的中國近現代史，我覺得很慚愧。1960年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先生曾計畫利用同仁的研究成果，匯集出一部中國近代史，未能實現。郭先生過世後，歷七、八任所長，都沒有完成郭先生的遺志。

郭廷以先生晚年以自己一人之力完成《近代中國史綱》。這部書於1979年由香港大學出版，一共有八百多頁，內容由明末清初寫至1950年韓戰爆發，

這是非常值得推薦的一部書。《近代中國史綱》有幾個特點：第一，有關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郭先生的觀點與很多人不同，郭先生重視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第二，這部書是從政治史的角度撰寫，體系非常完整；很少深入論述經濟、社會方面的問題。第三，全書雖沒有甚麼註解，但若仔細看，每句話都有證據，沒有空談。

在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國史綱》出版約20年後，聯經出版公司於1998年出版我的《中華民國史稿》，約有六百八十餘頁。這部書有兩個特點，第一，這部書出版時，臺海兩岸學術交流已有十餘年，我在撰寫該書時，引用了相當多的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後來日本學者山田辰雄先生質疑這些成果是否值得引用，但我認為許多史實是需要兩岸學者共同來認定，而不是由我一人來認定。第二，許多人認為中華民國史和中國近代史，應止於1949年，但《中華民國史稿》則從1912年寫至1990年代中華民國在臺灣，往後探討近五十年之多。

與《中華民國史稿》同時出版的，有陳永發先生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這部書分成上下兩冊，共一千一百餘頁。該書有兩大特點，首先，該書由五四運動寫到鄧小平、江澤民時代，體系完整。其次，該書引證的資料非常豐富，標題及內容活潑。我和陳永發先生的書能夠出版，要感謝前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吳先生感於臺海兩岸所寫的近代史各說各話，請劉廣京先生寫一本近代史，作為兩岸都能接受的國民歷史讀本。劉廣京先生約了我與陳永發先生，決定以《近兩百年中國史》為題，三人分工合作，劉廣京先生寫「晚清篇」，我寫「民國篇」、陳永發寫「中共篇」。但由於劉廣京先生稿債太多，來不及完成就過世了。吳大猷先生所關心的不是近代史研究，而是國民教育，希望我們所寫的書，篇幅不要超過三十萬字。但是我們兩個書呆子，下筆後便不能自休，陳永發的書幾乎有百萬字之譜。中研院近史所雖未能按照郭先生的想法，寫出一套較有系統的中國近代史，但若把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國史綱》、我的《中華民國史稿》與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三書合在一起，也可勉強說是一部不完整的中國近代史。

臺灣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機構，除了中研院近史所之外，還有兩個重要機構，一是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現稱黨史館），另一個是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於1970-1980年代在秦孝儀先生領導下，非常活躍。1970年代傳出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要修撰中華民國史，臺灣的政學界感到非常震驚，在前朝滅亡以後，後朝為前朝修史，中華民國還未亡，大陸方面便要修中華民國史，當時實在不能接受。在秦孝儀先生的號召下，聯繫教育部、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與其他學術界人士，編了兩套書，一套叫做《中華民國建國史》，共分五編：「革命開國」、「民初時期」、「統一與建設」、「抗戰建國」及「戡亂與復國」（請張海鵬先生諒解第五編的標題）。這部書以國立編譯館的名義發行，於1985-1991年陸續出版。之所以定名為《中華民國建國史》，表示中華民國還在建國，還沒有亡國。另一套簡稱「四大發展史」，即《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史》、《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中華民國社會發展史》、《中華民國文化發展史》，於1980年代中期以後由近代中國雜誌社陸續出版。無論是《中華民國建國史》或「四大發展史」，在體系上都非常完

整，學術價值也很高，但受限於當時兩岸還在敵對，有些標題與內容，現在看來並不妥當。

國史館的業務以修撰國史為主，因此長期從事修國史的工作。我個人與國史館來往較多的時期，大概是在瞿紹華先生與潘振球先生任館長的時候。國史館的纂修國史工作，已出版的有《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66冊、《國史擬傳》11冊和《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34冊，另有《中華民國社會志》、《中華民國外交志》等志書。如果把國史館的「紀要」、「傳記」、「志書」與張朋園先生的《民國職官表》合在一起，可以說是一部較完整的「中華民國史」。未來林滿紅館長如果能繼續領導國史館完成「中華民國史」，絕對是史學上的一大功臣。據我所知，北京近史所所修的中華民國史，還沒有完成，國史館還有競爭拔頭籌的空間。

除了近史所同仁、黨史會與國史館所出版的通論性著作外，目前坊間有不下三十種的近代史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每本書約有二、三十萬字，很少引證史料，不算學術性的著作。附帶一提的，我很高興在臺北一些書局的書架上，看到兩部臺灣以外的學者所寫的通論性的近代史，一是徐中約先生的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的中譯本，題名《中國近代史》，2001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上下兩冊，分為五編，從清朝開國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代。有點遺憾的是，徐中約先生的書不寫中華民國六十年來的發展，第四十二章的末節標題是臺灣與中國，副標題是統一的前景，如果在四十年前，我就以為是談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現在卻是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臺灣。另外有一套書，就是張海鵬先生領導北京近史所同仁編寫的《中國近代通史》，十卷本，留待張海鵬先生介紹。不過我有一個感覺，大陸學者寫近代史也好，寫現代史也好，寫20世紀史也好，僅關注中國大陸而忽略臺灣，這樣的作法缺少中國近現代史應有的完整性。當然，如果大陸學者承認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已獨立而去，另當別論。

四、張海鵬教授談中國大陸方面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

剛剛張朋園先生、張玉法先生對美國、臺灣以及中國大陸一些中國近代史的出版品都作了介紹。我自己對中國近現代史的一些研究之成果都表示尊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很早就瞭解，而且尊重臺灣、特別是中研院



張玉法院士（左）與張海鵬教授（右）

林正慧攝

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術著作。

我接到這個題目後，也一直在想，到底該談些甚麼內容。身在臺北，我也沒有特別帶些甚麼資料，所以想談中國近、現代史的分期，這在大陸學界是個爭議性很大的題目，就是何謂「中國近代史」，何謂「中國現代史」，長期以來我們都有些爭論。

二十年前中國大陸講「中國近代史」，一般是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起點，討論至1919年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以後則被學界稱為「中國現代史」。不過我查過北京各個圖書館，包含北大、清大等大學圖書館，1949年以前出版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書籍，對「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兩者之間並沒有明確的區分。不同的名稱，處理

的對象卻差不多。胡繩先生曾於1954年時，寫了篇「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投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刊物《歷史研究》上。這篇文章中討論何為「中國近代史」、何為「中國現代史」時，把1840年到1919年這段歷史階段稱為「中國近代史」。這篇文章發表了後，引起對於分期問題的熱烈討論，長達三年之久。這些討論後由《歷史研究》編輯部將討論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文章匯集成一本小冊子。¹這樣的分期方法讓後來討論中國現代史分期問題的文章，多採用這樣的觀點。因此學界很自然把1840到1919年視為中國近代史。

剛剛張玉法先生提到郭廷以的《近

1 歷史研究編輯部，《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

代中國史綱》，事實上郭先生最早的版本是1941年在重慶出版，當時稱為《近代史綱》，由明末清初開始編寫。另外鄭鶴聲先生，他於1944年在重慶出版《中國近世史》，也是主張應從明末清初歐洲人、葡萄牙人到東方開始。我看過1949年以前七、八十種中國近代史的書籍，主張由明末清初開始寫的書籍是少數，絕大部分仍主張由鴉片戰爭開始。郭先生和鄭先生的書，僅寫到清朝中葉，我想應是當時正值抗戰期間生活變動，加上所能看到的資料也不多，要想寫部完整的中國近代史是件困難的事。另一方面，我認為或許這與兩位先生把中國近代史的起點設定過早有關係，所以他們兩位的中國近代史，實際上是寫明、清史，或是簡明的清史，因此僅介紹到清中葉。

胡繩先生在1954年的文章，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這些討論的文章，都很自然的把中國近代史看成是從1840到1919年之間的歷史。1955年，北京近史所第一任所長范文瀾先生，他出版《中國近代史》上冊。這本書是他在1947年於華北清華書院出版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第九版。同年他又在上海和重慶出版了《中國近代史》，但他沒有用「范文瀾」這個名字，而用「武波」這

個筆名，「武波」是跟「文瀾」對映。這部《中國近代史》是范先生於1945年在延安完成的初稿，當時他手頭所能掌握的資料和書都相當有限，1949至北京後，發現該書有很多錯謬之處，後來由社科院年輕一輩的同仁幫他核對資料，逐年修訂，1955年出了第九版。

這本書的前言提到「既然現在大家都認為『一九一九年』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分期點，所以我的書就只能代表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或稱為《中國近代史》上冊。」因為范先生只寫到義和團止，他準備把義和團以後到辛亥革命以後的部分，稱為《中國近代史》下冊。他的前言點出當時學界普遍認為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的一部分。這樣的觀點在1950年代中期大致被學者所接受。儘管這看法當時還是有很多人不同意，有許多有地位的學者持反對意見，包括後來的近代史所所長劉大年先生，認為近代史應該寫到1949年，而非1919年，但普遍而言，還是以1919年為一分期點。所以1950年後，出版約幾百本的中國近代史，時間斷限都是1840年到1919年為主。

1979、80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又有學者討論有關中國近代史究竟如何分期，是否以1919年為分界線。胡

繩先生在1981年針對國民出版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本書銷量超過百萬冊，出版社多次再版。胡繩是位功力很深厚的近代史學者，他在該書前言提及過去很多學者認為近代史應延長到1949年，現在看來應該是有其道理。此後在他出版的近代史的書中也多採用這樣的分期方法。換言之，胡先生更正了他在1954年所提出近代史應由1840年到1919年的主張。

儘管他提了這樣的意見，但在中國近代史學界，仍是把1919視為分期點。1981年以後，中國近代史學界針對這樣的分期又有許多討論。1997年北京近史所期刊《近代史研究》發行到一百期，我便寫封信給胡繩先生，希望他為這「一百期」寫幾句話。這時胡繩先生的身體已經不好，正在江蘇的鹽城休息養病。後來得到胡先生的回覆，²胡先生實際上與他在1981年《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本書的前言一樣重申近代史應

到1949年比較合理。把1919到1949年稱為「中國現代史」這樣的分期方法還是有些爭議。

我個人也一直主張中國近代史應延長到1949年，藉著胡先生的看法，我也寫了篇文章，論述為何延長至1949年的理由。在1998年初於《光明日報》發表我對分期的簡要看法，其後又在《近代史研究》這份刊物發表了全文，這篇文章發表後在中國大陸地區轉載很多。³學者們一般認為，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大陸的近代史學界逐漸接受將1949年以後視為「中國現代史」。據我所知，在中國大陸有些大學、高校，按照這個思路由學校的教研室改寫近代史。這也是說中國近、現代史分期的問題，在中國大陸已逐步獲得解決。

我們所出版的第一本依照1840年到1949年這個分期來寫的中國近代史，是1999年在我主持下的《中國近代史：1840-1949》，這是一本約35萬字篇幅較小的書。這是中國大陸公安部認為應該對基層警員實施人文教育，請學者撰寫簡明、普及的歷史讀物，因此便邀請我寫中國近代史，剛好藉此機會，貫徹中國近代

2 胡繩先生給張海鵬先生的回覆是：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這以後的三十年，視為一個整體，總稱之為「中國近代史」，是比較合適的。這樣中國近代史就成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歷史，有頭有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歷史可以稱為「中國現代史」，不需要在說到1840-1949年的歷史時，稱之為「中國近現代歷史」。引自張海鵬，〈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淪”與“上升”諸問題〉，《近代史研究》，1998年2期（北京：1999年6月），頁1。

3 張海鵬，〈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淪”與“上升”諸問題〉，《近代史研究》，1998年2期（北京：1999年6月）。

史是從1840年到1949年這個觀念。

剛剛張玉法先生提到我主持編寫的中國近代通史，我為各位簡單說明這本書的緣由。北京近史所在1950年代中期，當時的所長范文瀾先生、副所長劉大年先生，也像南港近史所的郭廷以先生一樣有想規劃進行完整的中國近代通史編寫，但當時他們的分期斷限只到1919年，同時也進行專題研究。不過50、60年代甚至到70年代，中國大陸整體學術環境並不穩定，政治運動非常多，加上文革十年，學者們很難安定下來去看書、做研究。所以1950年代中期，雖然已經提出要進行「中國近代通史」，不過始終都是存在於計畫階段，雖然寫了些書稿，不過很難正式公布。

直至1999年，北京近史所出版了三十餘萬字的《中國近代史》後，我感到北京近史所應該有責任撰寫一部較為完整的「中國近代通史」，加上學術條件等各方面已相對成熟。除確定分期由1840年到1949年外，對於整部書的整體框架也有比較相近的共識。其次，以過去的情況而言，除了政治運動等外在環境干擾之外，學術準備也比較不足，但目前北京近史所有一批較年輕的學者，年紀約在四十歲上下，且都有出版一、二本專著的經驗。因此在這些條件下，

我於1999年邀集這批學者著手寫一部通史性的中國近代史。我的方式是以每一卷由一位學者負責，負責的學者可以再邀請其他學者共同來參與。本來希望2004年能把這套著作完成，後來稍有延遲，遂在2005年才完成出版。

這部書的完成，對我而言是個成功的經驗，若由我自己來評價並不適合。但是這部書相較於過去，有幾個特點：首先，分期拉長至1949年，不同於過去的近代史；其次，參與作者的陣容比較整齊，都是研究能力較強的青壯年學者；第三，學者廣泛地至各地蒐集近代史的資料，其中有至美國、俄羅斯、英國等地，甚至也包含臺灣。書中第一卷總論〈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概說〉，由我負責撰寫，我宏觀地從近代史的發展闡釋中國近代史的分期方法，此後書中各卷則不再議論，僅按照歷史事實敘述。我覺得這是中國大陸六十年來體例完整且最大部頭的一部「中國近代史」的叢書，實際約有550萬字，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套書我覺得可以推薦給各位。

另外還有一本是北京大學中共黨史方面的專家沙建孫教授主持編寫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這本書是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作為提供中國大陸大學入學非歷史系新生上課使用的教

科書。這本書採舊式的分期方法，年代從1840年一直寫到近幾年。不過它主要的目的是對大學生傳達思想及理論的教材，因此未按照嚴謹的學術計畫去編寫，很難視為標準的學術專著。這本書約三十餘萬字，其特點是綜合一百七十年以來歷史發展的脈絡，寫出基本的觀點與看法，也是胡錦濤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從頭看到尾的一本著作。若從歷史著作的角度，我並不向大家推薦這本書。但從最基本的近代中國歷史觀點、看法，可以瞭解中國大陸的大學新生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知。

此外，還有一本為北京近史所出版的《中華民國史》。1972年7月，我們剛從河南的幹校全部返回北京。1972年的11月，北京近史所組織了三個組，第一組寫中華民國史，第二組編中華民國大事記，第三組編中華民國專題史料。從1973年開始，陸續有些出版品。當時文革還未結束，出版品都是內部流通的，後交由中華書局刊印。直到1978年，近史所寫中華民國史的計畫才在報紙上公布，1981年「武昌辛亥革命研討會」開始被討論。

1980年代初，臺灣的歷史學界因應大陸撰寫「中華民國史」計畫，召開很多場座談會。1982年，孫斯白先生曾寫

篇「答臺灣學者」投於北京《近代史研究》。這篇文章詳細介紹北京近代史研究所，並說明「中華民國史」的研究是學術行為非政治行為。中國大陸學者來寫中華民國史，斷限是寫到1949年，未必是後朝修前朝的觀念，其實回歸近代史研究的學術本位，從近代史出發往後延伸，自然不能不進入中華民國史的研究。

談到《中華民國史》，我也感到很慚愧，擔任十一年所長，始終沒能把這部書完成。張玉法先生曾跟我提到大陸學界寫中華民國史在前，臺灣修《中華民國建國史》在後，《中華民國建國史》已經完成多年，但直到今天我們的《中華民國史》都還沒全部寫完，這一點我實在感到很慚愧。

《中華民國史》預計寫十二卷，現在已經完成七卷，還有五卷已經交稿，我估計一年之內可以全部推出。不過現在發現早年出版的七卷，在史料方面仍有未妥當之處，在體例上也有意識型態的問題，用字措辭還是有些尖刻之處，未來還是必須加以修訂。希望未來兩、三年內，能把十二卷的《中華民國史》完成。這部書我也想推薦給各位看。這是北京近代史研究所花了很多心血進行的，可與《中華民國建國史》這套書，以及張玉法先生建議的其他四部書對照



座談會一隅

林正慧攝

起來看，可以得到更多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面向。

另外大陸方面還有約七、八部的《中華民國史》，如南京大學張憲文主編的四卷《中華民國史》，研究時間至1950年代，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南京大學有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就是由張憲文教授擔任主任，南京大學開展中華民國史研究，張憲文教授貢獻很大。另外，張憲文教授還於1985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一卷的《中華民國史綱》。我雖然沒有很仔細地翻閱，但印象深刻的是，他討論四大家族與官僚資本的關係時，對於陳立夫、甚至蔣介石是否構成官僚資本、國家資本的問題仍然採懷疑的態度。另外還有本2006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華民國史》，採傳統修史的體例，十卷本紀、論（接近紀）、志、傳、表等傳統體裁來寫。

另外我要介紹的第六本書，是胡繩先生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的歷程和經驗1921-1991》。胡先生是中國社科

院的院長，這本書是在其主持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所時所推動編纂的書籍，我覺得也適合介紹給各位，篇幅不長，約60萬字左右。他是學者出身，對於共黨史的研究能以較客觀的觀點來敘述。我覺得文字方面通順、平實，很值得向各位推薦這本書。

另外張玉法先生提到中國近代史中沒有提到臺灣，我覺得這的確是不足。我也在中國大陸學界主張未來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應該有專章提及臺灣部分。我非常贊同張玉法先生的意見，未來在編寫中國近代史方面的書籍，應該反映臺灣歷史的發展。

五、總結（林館長滿紅）

聽了三位的談話，我有一些想法，國史館目前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展覽，我會將今日所談的想法陸續放入展覽中。日後國史館除了專題研究外，也會推動通史的寫作。另外「國家歷史資料庫」也可以朝正史的體例來規劃，試著透過網路完成修史的工作。